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道路：1949—2009

编者按：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60 年来，中国走过了不平凡的路程，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年，这一复杂的具有历史独创性的社会变迁，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而且深刻影响了世界，构成世界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内容。为了在全球视野中以学术的方式考察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独特性质和价值得失，阐发其在文明发展中所蕴涵的世界历史意义，并在对未来走向的远见中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本刊特约请国际学术界的学者撰写专文，围绕“全球视野下的中国道路：1949—2009”这一主题，发表各自的见解。作为学术探讨，这些见解并不代表本刊编辑部的意见。

坚守方向、探索道路： 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六十年

王绍光

摘要：在世界性经济危机与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将维持正增长的强烈反差对比之下，重新审视中国坚守的方向和走过的道路，意义非同寻常。共和国的前 30 年为后 30 年的改革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共和国的后 30 年继续进行探索，取得了多方面的辉煌成就。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不是有没有详尽的蓝图，而是有没有认清社会主义方向的视野，有没有不折不挠地迈向社会主义未来的勇气。尽管今天的中国还存在着大量问题，面临着多重严峻的挑战，但只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未来的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关键词：社会主义 中国 经济增长 人类发展

作者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北京 100084）。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当《共产党宣言》最初用德文在 1848 年出版时，“共产主义者同盟”还是一个秘密团体，其影响局限在英、法等欧洲国家。过了半个世纪，到 19 世纪末叶，这个“幽灵”出现在中华广袤的大地上。又过了半个世纪，到 20 世纪中叶，社会主义已经变成滚滚洪流，席卷全球。以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的中国共产党也在此时夺取了全国政权，神州大地开始英姿勃发地迈向社会主义。再过半个世纪，到 20 世纪末叶，一度红红火火的社会主义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以至有人大胆断言：历史已经终结，人类社会只有资

本主义一途，别无选择。

在过去 20 多年里，“市场原教旨主义”甚嚣尘上。它的许诺很简单、也很诱人：只要将财产权交给私人，将决策权交给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私人业主，将政府干预减至最低程度，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会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无尽的财富，“下溢效应”最终会让所有人受益。

然而，正如卡尔·波兰尼指出的那样，“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物质，否则这样一种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否则，它将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为一片荒野”。20 世纪末，在“华盛顿共识”肆意蔓延的同时，穷国与富国、穷人与富人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大，致使贫富差距最大的拉丁美洲国家纷纷向左转。到 21 世纪初，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危害已变得如此明显，以至于它的一些有良知的信徒也看不过眼。香港《信报》创办人林行止先生自称写了三十多年政经评论，在 2007 年 10 月 16 日的专栏里，他开始对于自己“年轻时是盲目的自由市场信徒……一切讲求经济效益，认为企业的唯一功能在替股东牟取最大利润”表示反省。2008 年 4 月 28 日，他又发表专栏文章，重申“对过去理直气壮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颇生悔意”，因为“看到了太多不公平手段和欺诈性活动，而一些本以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则经不起现实考验”。他并恳切地希望“中国不要彻底走资”，认为“社会主义的确能够维系社会公平”。

其后不久，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从美国蔓延至全世界，作为资本主义象征的大型企业一个接一个面临破产倒闭的厄运。迫不得已，从冰岛到爱尔兰，从澳大利亚到日本，从英国到美国，政府纷纷出手将银行、保险公司、汽车业国有化。难怪美国《新闻周刊》封面文章不无揶揄地惊呼：“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了！”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虽然世界经济危机也拖累了中国，但现在全世界都承认，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将维持正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火车头之一。在这种强烈的反差对比之下，重新审视中国坚守的方向和走过的道路，意义非同寻常。

一、前 30 年的探索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指明了新中国未来的方向，即“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在他看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使中华民族不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而是一个“站起来”的民族。

建立人民共和国以后，毛泽东反复强调，我们的总任务是，“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到 1957 年，他把这个目标清楚地概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3 页。

林行止：《企业多显人性 共造和谐社会》，《信报》2007 年 10 月 16 日。

林行止：《粮食危机中对富人和中国的期待》，《信报》2008 年 4 月 28 日。

Jon Meacham and Evan Thomas, "We Are All Socialists Now," *Newsweek*, February 16, 2009.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471 页。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年，第 3—7 页。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125—131 页。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2 页。

括为“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还十分贫穷落后，毛泽东非常重视生产力的发展。他指出：“韩愈有一篇文章叫《送穷文》，我们要写送穷文。中国要几十年才能将穷鬼送走。”他还提醒全国人民，“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他认为，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即 15 年左右，才可以打下一个基础；要经过大约 50 年即十个五年计划，才能建成一个富强的中国。当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

既然方向是明确的，渡过 1949—1952 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以后，毛泽东便开始了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一) 所有制方面的探索

如表 1 所示，1952 年，公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还不大，非公有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将农业和手工业的个体所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将私营工商业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使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成为我国的经济基础。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也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因为只有先解决所有制问题，才能使生产力获得解放，为发展新生产力开辟道路，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生产创造社会条件。经过四年时间，中国于 1956 年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到 1957 年，公有经济已一跃占据国民经济的支配地位。

表 1 各种经济成分比重变化表 (%)

年 份	公有经济			非公有制经济	
	国有经济	集体经济		资本主义经济	个体经济
		合作经济	公私合营		
1952	19.1	1.5	0.7	6.9	71.8
1957	33.2	56.4	7.6	0.0	2.8
1978	56.2	42.9		0.9	
1997	41.9	33.9		24.2	
2005	31.0	8.0		61.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伟大的十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年，第 36 页；中新社：《数字看变化：国有经济地位稳固 非公经济比重上升》，2002 年 10 月 7 日，<http://www.jiaodong.net/news/system/2002/10/08/000532129.shtml>；李成瑞：《关于我国目前公私经济比重的初步测算》，2006 年 5 月 23 日，<http://www.wyzsx.com/Article/Class4/200605/6832.html>。

不少人认为，1957 年以前，中国曾完全照搬苏联模式。这完全是误解。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很清醒，“我们信仰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我们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不是硬搬苏联的经验。硬搬苏联经验是错误的。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和农业的合作化是跟苏联不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03—418 页。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167—173 页。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125—131 页。
 《毛泽东文集》第 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495 页。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1 页。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 6 卷，第 316 页。

同的”。苏联对资本家采取了剥夺政策，甚至试图在肉体上消灭资本家；中国则通过赎买的方式将私人资本转化为公有资本，力图将他们改造成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苏联采取命令主义和专横的方式进行农业集体化，并对富农采取以暴力手段彻底剥夺和消灭的政策；中国的农业集体化则不带有苏联那样的强制性，过程也没有苏联那么混乱。结果当然也不一样，“苏联农业集体化后几年是减产的，而我们农业合作化后是增产的”。

虽然毛泽东希望有朝一日实现所有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但他特别强调，在现阶段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的界限“必须分清，不能混淆”。“苏联宣布了土地国有，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斯大林不卖拖拉机生产资料给集体农庄，我们卖给人民公社。所以在我们这里，劳动、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统统都是集体农民的，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的。因此，产品也是集体所有的。”苏联在1936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次年，国家所有制已占到全部工业成分的99.97%；国营农业在农业固定基金中所占的比重也高达79.2%。此后，在苏联，这种生产资料高度集中于国家的状况，不仅没有削弱，反而被不断强化。而中国则不同，1956年以后，虽然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直到改革开放前夜的1978年，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才刚刚过半（表1）。同一年，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企业占77.16%，集体企业占22.14%。但从工业企业数目上看，国有企业只有83700个，而集体企业多达264700个。除此之外，中国还在“大跃进”和“文革”后期出现了一种新型企业，即农村“社队企业”（1984年后改称“乡镇企业”）。1978年全国社队企业达152万个，社会总产值491亿元，占全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为7.17%，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为24.10%，并安置农村劳动力2827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9.2%。企业数目如此之多，使得严格的中央计划难以实现，也为改革开放后出现竞争的局面奠定了基础。

（二）计划方面的探索

如果说1956年以前有“照抄”苏联的地方，那主要是指在制定五年计划方面。大规模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牵涉到一系列复杂的问题。毛泽东承认：“对于政治、军事，对于阶级斗争，我们有一套经验，有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还没有经验”。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领导人对建设还不熟悉，唯一的出路便是向苏联学习。中国从1951年初就开始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前后共编制了5次。其间，毛泽东还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李富春为副团长的政府代表团到苏联取经。周恩来和陈云在苏联长达一个多月，李富春则率代表团在苏联逗留达10个月之久。

虽然“一五”是向苏联学习的产物，但它不是一个苏式计划。主持制定该计划的陈云便坦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76页。1979年，在与外宾谈话时，邓小平也明确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5页。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76页。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2000年，第29页。

张建勤：《中苏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比较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1—133页。

刘国光、董志凯：《新中国50年所有制结构的变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5—6期，第27—28页。

王凤林：《我国社队企业的产生与发展》，《中国农村观察》1983年第4期。

《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0页。

袁宝华：《赴苏联谈判的日日夜夜》，《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1期，第16—26页。

承：“这个计划，有比较准确的部分，即国营经济部分。也有很不准确的部分，如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都只能做间接计划（即不是指令性计划），而这些部分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又占很大比重。我们编制计划的经验很少，资料也不足，所以计划带有控制数字的性质，需要边做边改。”另外，这个 1953 年开始的计划，直到 1955 年 7 月才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同年 11 月 9 日和 12 月 19 日，国务院才先后发布命令，要求各地、各部门执行。而到 1956 年，计划规定的任务就已经提前完成了。可见这个计划并不像苏式计划那么死板。

基于毛泽东有关矛盾普遍性的哲学观和对“一五”的观察，他并不相信严格的苏式计划。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对第 26 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批评最多。他认为，“有不平衡，有比例失调，才能促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规律。出了一点毛病，就以为不得了，痛哭流涕，如丧考妣，这完全不是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因此，“计划常常要修改，就是因为新的不平衡的情况又出来了”。毛泽东更多的是强调统筹兼顾，综合平衡，两条腿走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现几个同时并举（包括工农业同时并举，轻重工业同时并举，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洋法土法同时并举，中央与地方同时并举）。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二五”（1958—1962）开始执行不久就被接踵而来的“大跃进”打乱。其后出现的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失调使得经济建设不能按原来的部署继续进行，只得于 1961 年实行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八字方针”。这次调整一直持续到 1965 年，致使“三五”延迟到 1966 年才开始。

但“三五”（1966—1970）开始之际正是“文革”爆发之时。在“文革”最初三年，任何计划工作都难以进行。1967 年虽然订出了年度计划，但无法传达到基层；1968 年干脆就没有计划；而 1969 年，除原油产量外，几乎完全没有实现计划指标。

“四五”计划（1971—1975）指标直到 1971 年 4 月才下达。而到了 1973 年，毛泽东认为，计划工作仍没有走上正轨，有必要拟定《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修正草案）》。

由此可见，毛泽东时代的计划体制远不像苏联体制那么僵化，而总是变动不居。不过，变动不居的代价是经济增长呈现剧烈的波动性（见图 2）。

中国计划体制与苏联更大的不同是其分权的程度。毛泽东从来不喜欢苏式中央计划体制，这主要是因为他从骨子里厌恶官僚体制。早在 1953 年，他就反对地方工业上缴利润太多，因为这意味着“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就太少了，不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到 1956 年谈《论十大关系》时，他反复强调，“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1958 年 2 月，他

《陈云文选》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235 页。

柳随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国民经济》，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17—19 页。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第 73 页。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第 71 页。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455—456 页。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356—361 页。

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243—247 页。

《毛泽东文集》第 6 卷，第 288 页。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31 页。

又提出在中国搞“虚君共和”的设想。此后，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极力推行权力下放。第一次是1957—1958年，中央大规模下放了财权、计划管理权、企业管理权。由于“大跃进”受挫，1961年后，在刘少奇、陈云主持下，中国恢复了对国民经济的集中统一管理，收回了前几年下放的权力。然而对毛泽东来说，收权仅仅是摆脱暂时困难的权宜之计。一旦经济好转，他决心再一次打碎苏式的中央计划体制。1966年3月，毛泽东在杭州政治局会议上再次提出“虚君共和”的口号，批评中央收权收得过了头，指示凡是收回了的权力都要还给地方，用他的话说就是“连人带马全出去”。不过，几个月后开始的“文革”延迟了他的分权计划。1970年代初，形势刚刚稳定下来，毛泽东再一次发起了分权运动。这次，他要求所有“适合”地方管理的企业统统将管理权下放到地方，连鞍钢、大庆油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开滦煤矿这些巨型企业也不例外。与此同时，财政收支权、物资管理权也再次下放。

虽然其后周恩来、邓小平加强了中央政府的主导权，但到“文革”结束时，中国已经是一个相当分权化的国家，与苏式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迥然不同。这种不同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国家集中统一分配的物资远比苏联少得多。苏联把物资分为三种，即分配权限属于国家计委的“基金化产品”，分配权限属于中央各部的“集中计划产品”，以及分配权限属于各加盟共和国的“非集中计划产品”。基金化产品在1950年代初就有2370种之多，而“非集中计划产品”的份额很小。中国也把物资分为三类，即由国家计委统一分配的“统配物资”，由中央各部分配的“部管物资”，以及由地方分配的“三类物资”。如图1所示，到“文革”后期，统配物资与部管物资加在一起只有217种。此外，几次分权让地方政府尝到了甜头，它们对完成国家调拨指标的态度未必总是唯唯诺诺；更有甚者拒绝按国家调拨价将本地物资卖给外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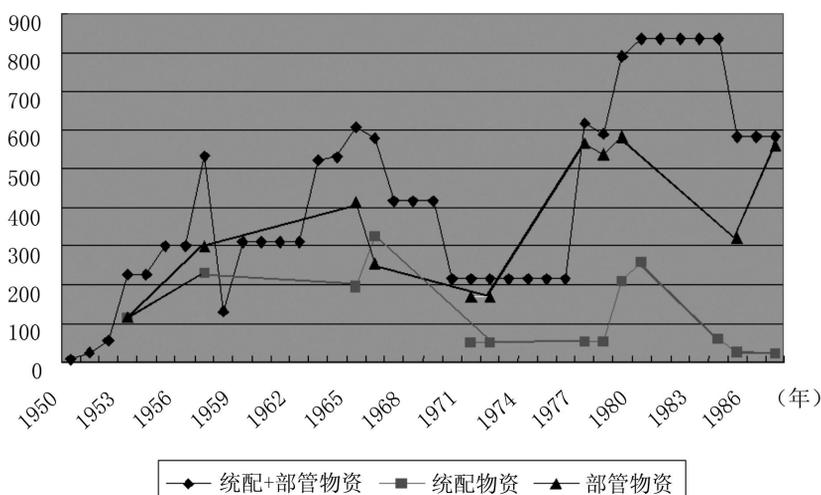


图1 国家统配物资与部管物资的种类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796—797页。

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7—251页。

赵德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67—1984》，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2—43页。

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第225—232页。

Thomas P. Lyons,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Planning in Maoist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213-218.

赵德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67—1984》，第60—62页。

(三) 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方面的探索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前，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集中在所有制上，50 年代中期以后开始转移到计划体制上。50 年代后期他还开始了另一方面的探索，即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改变人与人的关系。

实际上，早在 1957 年毛泽东就提出，虽然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但“人的改造则没有完成”。次年，在评论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他进一步指出，“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一定要从各方面妨碍这种平等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彻底破除。破了又会生，生了又要破”。那时，他用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手段是搞整风，搞试验田，批判等级制，下放干部，“两参一改”（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其后，1963—1966 年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但在他看来，这些措施都不足以打破“资产阶级法权”，消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毛泽东于“文革”前夕发表的《五七指示》是他晚年的理想宣言，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憧憬的是一个逐步消灭社会分工，消灭商品，消灭工农、城乡、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这三大差别的扁平化社会，其目标是实现人们在劳动、文化、教育、政治、物质生活方面全方位的平等。“文革”前期对所谓“走资派”的批判以及“文革”后期对“新生事物”（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革命样板戏，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工宣队，贫宣队，赤脚医生，合作医疗，老中青三结合，工人—干部—知识分子三结合等）的扶持都可以看做实现他理想的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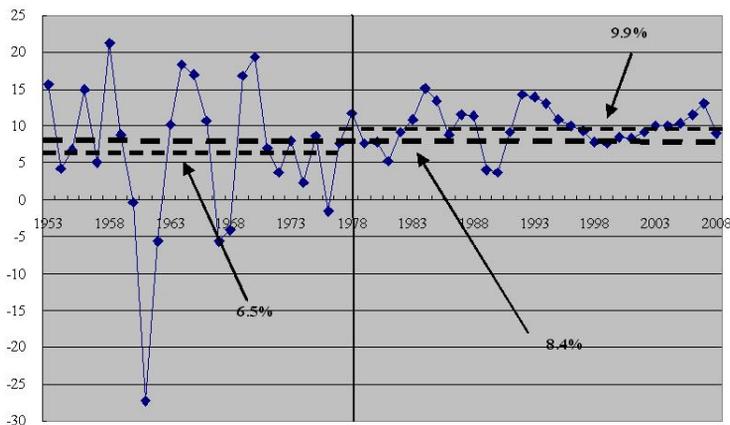


图 2 中国 GDP 增长率 (1953—2008)

资料来源：《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年；《中国统计摘要 200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 年，第 22 页。

对这一问题的整体性认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做过论断，此处不赘。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38、424—437 页。本文此处仅对实现人的平等关系等方面做些探索。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70—72 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年，第 579 页。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第 40—41 页。

简而言之，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集中在三个方面：在所有制问题上，中国没有偏重纯而又纯的大型国有企业，而是造就了上百万集体所有制的中小企业；在计划问题上，中国没有实行中央集权的计划体制，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将财政收支权、计划权、物资管理权下放给各级地方政府；在“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上，中国没有形成森严的等级制，而是用种种方式促进人们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地位上的平等，当然“阶级敌人”除外。

（四）前30年探索的成就

与苏式体制相比，中国成百万中小企业的存在、各地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以及分权的计划体制为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竞争创造了有利的制度条件。除此之外，尽管历经波折，毛泽东时代不仅取得了不俗的经济增长速度（1953—1978年间，GDP年均增长速度达6.5%，见图2），也为改革开放后的高速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的“硬件”与“软件”基础。

从“硬件”方面讲，毛泽东时代为中国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包括国防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个由铁路、公路、内河航运、民航空运构成的交通运输网络，为1980年代以后的经济起飞创造了有利条件。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治理大江、大河、大湖，修建了长达20多万公里的防洪堤坝和8.6万个水库，大大减少了肆虐千年的旱涝灾害；进行了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使灌溉面积比例由1952年的18.5%大幅提高到1978年的45.2%，基本上保证了10亿中国人吃饭、穿衣的需求。

从“软件”方面讲，首先，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以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种种措施使中国变成一个十分扁平化的社会，不存在任何势力强大的“分利集团”。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不平等程度仍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大量跨国实证性研究证明，平等往往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不平等往往导致经济停滞不前。因此，平等的社会结构是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增长的制度保障之一。“分利集团”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在1982年出版的《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提出的概念。他认为，过于稳定的政体容易滋生出势力强大的“分利集团”，它们不关心社会总收益，而是一心一意地“寻租”，想方设法要从现有社会总收益中多分几杯羹。奥尔森的潜台词是，隔一段时间来场“运动”是件好事，可以打烂“分利集团”，有利于其后的经济增长。在2000年出版的遗著《权力与繁荣》中，奥尔森更直接拿中国与苏联作比较，认为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毛泽东的“文革”打破了凝固的制度，使当时的中国不存在任何强势“分利集团”，为日后的改革扫平了道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苏珊·萝丝·艾克曼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奥尔森是不是个毛主义者？”

此外，毛泽东时代强调公共消费，而不是个人消费，尤其是在医疗与教育领域。那时，中国还很穷，但几乎所有的城乡人口都享有某种形式的医疗保障，使中国人民的健康指标大幅改善，平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增加到1980年的68岁，婴儿死亡率也从新中国成立

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第524—530页。

World Bank, *China 2020: Development Challenges in the New Century*,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1997, p. 8.

如 Alberto Alesina and Dani Rodrik, "Distribution, Political Conflict and Economic Growth: A Simple Theory and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in Alex Cukierman, Zvi Hercowitz and Leonardo Leiderman, eds., *Political Economy, Growth and Business Cycles*, Cambridge: MIT Press, 1992, pp. 23-50.

曼库尔·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吕应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曼库尔·奥尔森：《权力与繁荣》，苏长和、嵇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9—130页。

Susan Rose-Ackerman, "Was Mancur a Maoist? An Essay on Kleptocracy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Economics and Politics*, vol. 15, no. 2, 2003, pp. 163-180.

前的约 250 %减少到 1980 年的 50 %以下。当时中国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受到了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高度赞誉。中国低成本、广覆盖的卫生保健模式也在 1978 年的阿拉木图会议上受到推崇，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初级卫生服务运动的样板。在毛泽东时代，各级教育也高速发展。学龄儿童入学率由解放前的 20 %左右迅速增加到 1976 年的 97.1 %，成人文盲率由 1949 年的 80 %急剧下降至 1982 年的 22.8 %。表 2 显示，共和国前 30 年，基础教育发展很快。小学在校生人数增长了 6 倍，初中生增长了 55 倍，高中生增长了 62 倍。即使是“文革”中曾一度停办的大学在校生人数也比 1949 年增加了好几倍。

表 2 主要年份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数 (万人)

年 份	大 学	高 中	初 中	小 学
1949	11.7	20.7	83.2	2439.1
1959	81.2	143.5	774.3	9119.9
1969	10.9	189.1	1832.4	10066.8
1979	102.0	1292.0	4613.0	14662.9
1989	208.2	716.1	3837.9	12373.1
1999	413.4	1049.7	5721.6	13548.0
2007	1884.9	2522.4	5720.9	10564.0

让人们活得健康、有知识不仅是发展的目的，健康和知识也提高了人力资本的素质，反过来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对于经济增长，这种“软”基础设施与“硬”基础设施一样重要。假如没有共和国前 30 年在“软”、“硬”两方面打下的坚实基础，后 30 年经济的腾飞是难以想象的。这一点，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看得很清楚。“1949 年政治变革时中国的生活条件与当时印度的情况大致相差无几。两个国家都属于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列，死亡率、营养不良和文盲程度都很高。”但到改革前，“印度和中国所处的相对地位就决定性地确立了”，因为中国在初级教育和初级卫生保健方面取得了非同寻常的进步。因此，森得出结论：“改革前中国在教育、保健、土地改革和社会变化方面的成就，对改革后的成绩做出了巨大的积极贡献，使中国不仅保持了高预期寿命和其他相关成就，还为基于市场改革的经济扩展提供了坚定

例如世界银行的《1993 年世界发展报告：投资与健康》称中国当年在医疗保障方面取得的成就在低收入国家是“独一无二”的。见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3: Investing in Health*,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1993, p. 11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Primary Health Care: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imary Health Care*, Geneva: WHO, 1978.

赖立、张竺鹏、谢国东：《我国成人文盲十年减少近 1 亿 女性文盲率降幅大》，《中国教育报》2007 年 8 月 1 日，<http://www.edunews.net.cn/jzxx/OldNews/20078190600.html>.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年，第 81—82 页。

参见罗默 (Paul Romer) 和卢卡斯 (Robert Lucas) 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

阿玛蒂亚·森、让·德雷兹：《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黄飞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71 页。

阿玛蒂亚·森、让·德雷兹：《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第 80 页。

支持。” 刚刚去世的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更是用大量跨国数据证明，后 30 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快速增长，其奥妙就在于中国的劳动力素质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高。

近年来，人们往往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作为衡量各国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如图 3 所示，1950 年，中国是世界上人类发展指数最低的国家之一，仅为 0.16，与印度不相上下。到 1975 年，中国的指数已提升至 0.53，远远超过印度的 0.42（图 3）。

万丈高楼平地起，最关键的是要打牢基础。北宋的苏辙在《新论》中有一段很精辟的话：“欲筑室者先治其基，基完以平，而后加石木焉，故其为室也坚。”共和国的前 30 年就是打基础的 30 年。打基础是很艰苦、耗费时日的，而且打基础的人当时未必能马上享受高楼大厦的舒适。但是，如果没有前 30 年打下的坚实基础，就不可能有后 30 年那些拔地而起的宏伟楼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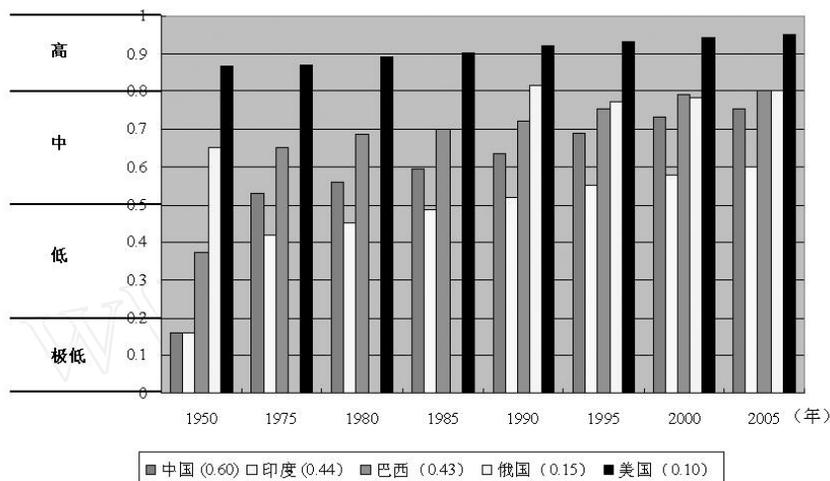


图 3 人类发展指数的变化：五大国比较

注：国家名称后面的数字代表 1950 年至 2005 年间，该国人类发展指数的增加值。

资料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网站，<http://hdrstats.undp.org/indicators/14.html>。

二、后 30 年的探索

尽管共和国前 30 年取得的成就超过以往任何时代，但到第二个 30 年开始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穷国。1978 年，全国 7.9 亿农村居民中有 2.5 亿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均年收入 100 元），相当于当时农村人口的 30.7%。当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才 133.6 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也不过区区 343.4 元。这种状况离社会主义的理想显然相去甚远，用邓小平的话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

阿玛蒂亚·森、让·德雷兹：《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第 70 页。

Giovanni Arrighi, *Adam Smith in Beijing: Linea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Verso, 2007.

Martin Jacques,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London: Penguin Group, 2009, p. 99. 同时，必须也要看到，共和国前 30 年“建立的时间不长，中国取得的成就只是初步的”，并且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参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 14 页。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 200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 年，第 109、111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225 页。

(一) 邓小平的探索

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在总结前 30 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新的探索。为了替下一步的探索扫除思想障碍，在 1978—1980 年间，邓小平首先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强调马克思主义也要发展，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否则就会僵化。这与当年毛泽东倡导摆脱苏联模式的桎梏有异曲同工之妙。邓小平特别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与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把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看做一个开放的过程；他不止一次坦承，“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在摸索之中”。

不过，有一点从一开始就是清楚的，“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既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

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从 1980 年起就开始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同样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邓小平的带领下，中国开始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将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1981 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突破了完全排斥市场调节的传统计划经济概念。1984 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又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出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性。1992 年，邓小平更明确赞成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此后，市场逐步取代计划，成为中国生产要素配置的基础性机制。

对社会主义而言，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发展生产力毕竟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分水岭；市场也不是社会主义特有的东西。那么除了实行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外，社会主义是什么呢？邓小平认为，第一是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改革开放初期，他强调，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公有制是不能动摇的，否则就会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从 1980 年起，他不再强调纯而又纯的公有制，而是强调公有制为主体，目的是为了给非公有经济的发展留出足够的空间。1985 年他说，“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资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确，那时公有制仍占整个经济的 90% 以上。哪怕是七年后他南方谈话时，在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公有制仍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即使到邓小平去世的 1997 年，公有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占有四分之三的天地（表 1）。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第二个特点是共同富裕。在他看来，“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12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37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27 页。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31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年，第 1347 页。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33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10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38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72 页。

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他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国家拿的这一部分，也是为了人民，搞点国防，更大部分是用来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和科学，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文化水平”。他解释道，“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同时他警告，“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类似的话，邓小平反复说了多次，为的是从理论上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区分开来。但在整个 1980 年代，他的关注点一直放在如何进行市场改革，如何加快对外开放，如何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如何激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等问题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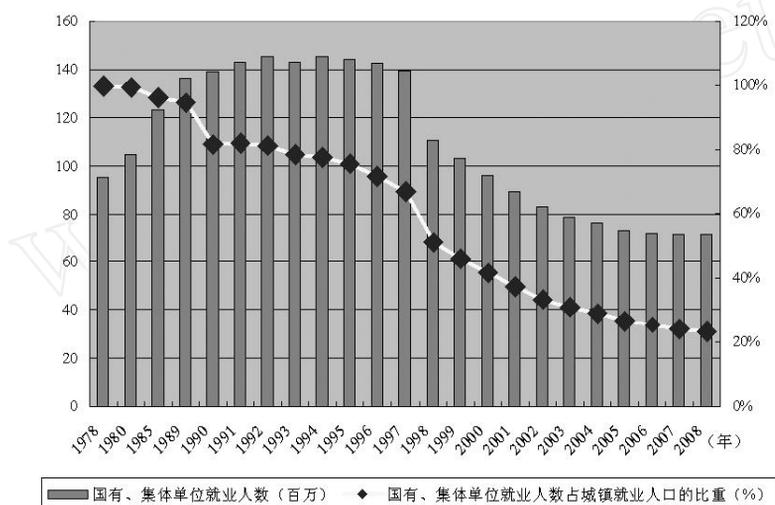


图 4 城镇公有制单位就业人数的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 2009》，第 45 页。

值得注意的是，1992 年南方谈话以后，邓小平的关注点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他更关注公有制为主体。在审阅十四大报告稿时，他开始重提“两个飞跃”的设想，即农村在实行一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还应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用他的话说：“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农村也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另一方面，他更关注共同富裕问题。1993 年，在与弟弟邓垦谈话时，他感慨道：“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么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这两方面的变化表明，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64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23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10—111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下），第 1349—1350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下），第 1364 页。

他认识到，即使经济快速发展，大多数人也未必一定收益。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才有可能“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不过，说这些话时，邓小平已经不管日常工作。他的这些观点要等到十余年后才公布于世。

邓小平在世时，公有制的一统天下已被打破。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迅速发展，还出现了不同所有制互相参股的混合所有制。不过，那时非公有制经济仅仅被看做公有制的“必要补充”，现存公有制企业也没有改变性质。这一点在图 4 中看得很清楚：虽然公有制单位雇员占城镇就业人口的比重从 1978 年的 99.8% 降到 1996 年的 71.6%，但公有制单位雇员的绝对数却在同一时期内从 9500 万增加到了 14260 万。

（二）十五大以来的探索

所有制格局的重大变革出现在邓小平逝世之后。在历次党代会报告中，没有哪次比 1997 年召开的十五大报告对所有制改革着墨更多。十五大报告对“公有制”和“公有制占主体”都提出了新的解释。“公有制”不仅包括传统的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还包括国家和集体控股的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以及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公有制占主体”被解释成“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反过来说，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公有资产不一定非占优势不可；对不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和领域，国有经济不必非占支配地位不可。如此说来，只要坚持这种“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十五大后，对现存公有制企业改制成为所有制改革的重点。抓大放小、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成为流行的口号。到 2005 年，国有中小企业改制面已达到 85% 以上，集体企业改制面更大，其中大批企业破产消亡了，更多的变成了私营企业；在净资产占全国国有企业三分之二的 2524 家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型骨干企业中，也有 1331 家改制为多元股东的股份制企业，改制面为 52.7%。与此同时，原来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也纷纷易帜，到 2006 年，全国 168 万家乡镇企业中，95% 实行了各种形式的产权制度改革，其中 20 万家转成了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企业，139 万家转成了个体私营企业。经过几年的改制，2004 年末，国家和集体投入占全国企业法人单位实收资本总额的比重降为 56%；2005 年，公有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降为 39%（表 1）；2007 年，国有、国有控股以及集体工业企业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降为 32%；同年，国有和集体单位从业人员占全部城镇从业人员的比重降为 24.3%。

与毛泽东、邓小平时代相比，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公有经济成分大幅减少，公有经济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显然，这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已经相去甚远。尽管如此，中国公有经济的成分仍然远远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除此之外，中国宪法规定，矿藏、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下），第 1364 页。

李荣融：《进一步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 实现国有企业的体制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在中国改革高层论坛上的演讲》，<http://www.sasac.gov.cn/n1180/n3123702/n3123987/n3125287/3188291.html>。

张卓元：《30 年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展望》，<http://finance.sina.com.cn/economist/jingjixueren/20080203/11264487740.shtml>。

赵悦：《乡镇企业的“前世今生”》，<http://www.cctv.com/program/cbn/20070424/102108.shtml>。

国务院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5-12/06/content_3883969.htm。

国家统计局：《改革开放 30 年报告之三：经济结构在不断优化升级中实现了重大调整》，http://www.stats.gov.cn/tjfx/ztfx/jnggkf30n/t20081029_402512864.htm。

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以及城市的土地都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都属于集体所有。这使得中国仍然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更加“社会主义”。正因为如此，国内外总有一批人或明火执仗地鼓噪“私有化”，或半遮半掩地摇晃“反垄断”旗帜，必欲将剩余的公有经济成分完全消灭而后快，从而在中国砍掉社会主义这面大旗。中共十七大重申十六大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一定让他们相当失望。

（三）后 30 年探索的成就

共和国后 30 年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取得了让世人瞩目的成就。

第一，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从 1978 年到 2008 年，中国 GDP 年均增长 9.9%，大大快于前 30 年的 6.5%。以前被人赞誉有加的亚洲“四小龙”都是些小经济体，其中最大的韩国也不过四千万人，相当于中国一个中等规模的省。日本在其高速增长期，人口也只要一亿上下，与中国最大的省差不多。作为一个十几亿人口的超大、超复杂经济体，中国连续 30 年高速增长，这在人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是名副其实的“奇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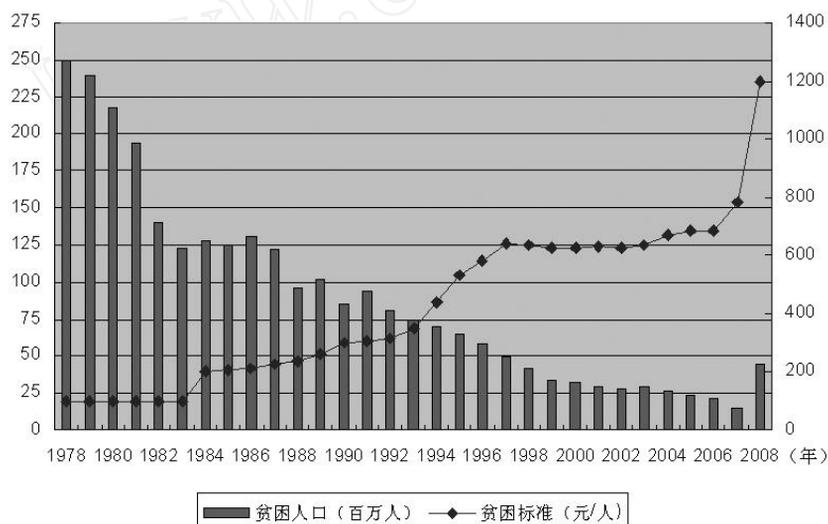


图 5 农村居民贫困状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 2009》，第 111 页。

第二，经济增长更加平稳。这从图 2 看得很清楚，后 30 年经济波动明显不像前 30 年那么频繁，波幅也没有以前那么大。尤其是 1992 年以后，经济增长曲线更趋平滑，标志着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大有进步。

第三，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如图 5 所示，在过去 30 年，中国政府已将贫困标准从 100 元提高到 1196 元。即便如此，农村贫困发生率也从 1978 年的 30.7% 下降到 2008 年的 4.2%。如果

美国保守组织“传统基金会”一位亚洲经济研究员最近撰文批评，“自当前的中国领导人掌权以来，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由化已经渐趋淡化。并且，当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由化逐渐销声匿迹时，国家干预开始卷土重来：控制价格，逆转私有化”。参见 Derek Scissors, “Deng Undone,” April 29, 2009, accessed at <http://www.heritage.org/press/commentary/ed042909a.cfm> “Liberalization in Reverse,” May 4, 2009, <http://www.heritage.org/about/staff/derekscissorspapers.cfm>.

按照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计算，中国的扶贫成就则更为显著。从 1981 年到 2004 年，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从 6.52 亿降至 1.35 亿，5 亿多人摆脱了贫困。而在同一时期，全球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只减少了 4 亿。换言之，如果排除中国，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倒增加了。难怪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赞叹道：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使得如此多的人摆脱了贫困，对于全人类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

当然，后 30 年的探索也不可避免地走过弯路。尤其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有些人似乎有意无意地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的“下溢理论”：只要经济持续增长，所有人最终都会受益，其他一切问题都迟早会迎刃而解。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思想下，为了追求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他们宁愿牺牲公平、就业、职工权益、公共卫生、医疗保障、生态环境、国防建设等，结果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有些问题已变得触目惊心，尽管经济持续增长，但工农大众享有的福利保障却越来越少。大规模下岗失业、上学贵、就医贵让许多人痛感缺乏经济与社会安全。在这个背景下，那些在前期改革中利益受损或受益不多的阶层对新推出的市场导向改革不再毫无保留地支持；相反，他们对凡是带有“市场”、“改革”标签的举措都疑虑重重，生怕再次受到伤害。

当人们普遍感觉到中国改革已经到了必须科学完善的时候，中央决策者也开始认真反思邓小平早已发出的警告：“如果搞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2002 年底召开的中共十六大试图重新解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含意，使用了“初次分配效率优先、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的提法。但贫富悬殊的残酷现实告诉人们，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问题（例如老板、经理、干部与普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样需要重视，单靠财税等再分配杠杆来调节是远远不够的。2003 年 10 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虽然仍然沿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但其分量已被“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大大冲淡。2004 年 9 月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干脆放弃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2005 年 10 月底，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又进了一步，提出未来中国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到了中共十七大，标准提法已变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从 2002 年起，中国政府还开始致力于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社会服务和保障体系（包括九年义务教育，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等），

世界银行东亚及太平洋地区扶贫与经济管理局：《从贫困地区到贫困人群：中国扶贫议程的演进——中国贫困和不平等问题评估》，北京：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2009 年 3 月，第 iii 页。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最初是由周为民、卢中原牵头的“社会公平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课题组提出来的，其主报告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通向繁荣的权衡》为题发表于《经济研究》1986 年第 2 期。1993 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正式使用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十五大坚持了这个提法。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 453 页。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2 年 11 月 18 日。

刘国光：《把“效率优先”放到该讲的地方去》，《经济参考报》2005 年 10 月 15 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2004 年 9 月 19 日。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新华网 2005 年 10 月 18 日。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年。

其进展速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大大充实了邓小平有关“共同富裕”的理念。如果说从1978年到1990年代后期中国只有经济政策、没有社会政策的话，那么在世纪之交，我们看到社会政策已经广泛出现在神州大地上了。没有一个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政府，没有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短短几年内出现这样历史性的“大转型”是难以想象的；这种“大转型”本身也构成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步骤。

三、结 语

到2009年，人民共和国渡过了它的第一个甲子。勿庸讳言，60年过后，对如何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依然没有一套完美无缺的方案；我们有的只是一个大致的方向，那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消灭剥削和压迫，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逐步建立起一个没有阶级对立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不是有没有详尽的蓝图，而是有没有认清社会主义方向的视野？有没有不相信历史已经终结的睿智？有没有不折不挠地迈向社会主义未来的勇气？有没有不断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理想新途径的胆略？

过去60年，中国一直在坚守社会主义方向的同时，不懈地探索着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当然，无论是前30年，还是后30年，中国都曾走过弯路。只要是探索，哪能一点弯路都不走呢？关键在于，中国领导人从不接受“历史已经终结”之类的谬论，从不相信存在什么“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模式。相反，他们更侧重于从实践和实验中进行学习，获取必要的经验教训，“可则因，否则革”，不断调整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以回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正因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顺乎天而应乎人”，无论是前30年，还是后30年，中国都取得了辉煌成就，书写了一篇比韩愈精彩千万倍的《送穷文》。从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看，在1950年，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属于“极低”之列，还不到苏联的三分之一；而到2005年，中国的指数已跨入“中上”的行列，离当年的“老大哥”不过一步之遥。在60年里，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快速攀升了0.6，远高于其他国家，证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正确的选择（图3）。尽管今天的中国还存在着大量问题，面临着多重严峻挑战，但只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未来的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责任编辑：王 广〕

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第129—148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4页。

王绍光：《学习机制与适应能力：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变迁的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第111—133页。

ABSTRACTS

**The Emerging Chinese Model of Development (1949-2009) : From the Global Perspective
Adhering to the Right Direction and Exploring New Paths : Reflections on Sixty Years of Socialist
Practice in China** *Wang Shaoguang · 4 ·*

To examine the directions and 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China's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t a time when the Chinese economy is growing rapidly despite the current world economic crisis is an act of no ordinary significance. Broadly speaking, China's sixty years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hases: the first thirty years from 1949 to 1979 and the second thirty from 1979 to 2009. The first thirty years of China's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of the next thirty years, a period in which China's continued exploration of new directions led to spectacular achievements. History teaches us that the linchpin of building socialism is not whether you have a detailed blueprint for socialism, but whether you have a grand vision for understanding socialism and the courage to direct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lthough China today faces many problems and even grave challenges, we will open up an ever wider path for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o long as our country adheres to the direction of socialism.

The Chinese Model of Development :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Zheng Yongnian · 20 ·*

With the success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increasing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Chinese model of development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However, in studying the Chinese model, many scholars, particularly Western ones, have avoided studying China's political model. Instead, they have conceptualized the Chinese model of development as a matter of purely economic success. In fact, however, it is extremely hard to understand the Chinese economic model without discussing the Chinese political model, because it is China's political model that has driven the success of its economic model. Many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face the grave challenge of building a stable political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the Chinese model of development provide a valuable lesson in this respect.

**China, a Country in Rapid Development : Commemorating the Six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th a Look at Prospect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 . Titarenko · 29 ·

China today has reached a level and stage of development that make it impossible to halt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The process is already irreversible. Though the way ahead is beset with difficulties, the country must continue her forward advance. The formulation of "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with its focus on people, clearly indicates that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egun to devote more attention to the human factor, thus giving an answer to those who allege that China violates human rights. 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offers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theory designed to solve the problems that have emerged in the cours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t represents a new phase in the adaptation